

绪 论

—

蒙古高原地处亚洲中部腹地，它的自然环境有许多值得注意的特点。

高原海拔平均一千米以上。四周大体环山。西南有阿尔泰山 与中亚、西域相隔；东南有大兴安岭，与松嫩平原相接；唐努山、萨彦岭、哈马尔山和肯特山等由西而东，形成高原北部屏障；阴山山脉横贯其南 断续相间 长达 2400 余里。高原内 座落在西北部的杭爱山较险峻；还有许多起伏不大，但连绵不绝的岗峦。

高原距海洋辽远，东南季风姗姗来迟，七月份，其“前锋”才能吹至高原南缘。受高山峻岭阻挡，季风难以深入内部，且时间较短，九月下旬便急于南撤，故冬季无雨，夏季雨量亦少。从东南向西北 干燥程度递增 温度递减。所以这是个较典型的干燥大陆。干

旱之灾，屡见不鲜。公元 684 年(唐中宗嗣圣元年)前后连续三年大旱“野皆赤地，少有生草”^① 1248 年(元定宗三年)大旱“河水尽涸，野草自焚。”^② 类似旱灾，史不绝书。

高原夏短冬长。即使是夏季，早午晚的温差变化也相当悬殊。“早穿皮袄午穿纱”是真实的写照。北方极地冷气不断向南或东南流动，从而形成北风或西北风，而且风力强劲。贵由(1246—1248 年在位)即大汗之位前夕，欧洲人柏朗嘉宾来到蒙古高原，恰遇到一场“凜烈风暴”他们被迫下马“躺在地上”“；灰尘弥天，以至于伸手不见五指。”^③ 这种风暴常能移动沙丘。元人虞集写道：“海风吹沙如卷涛，高为陀碛深为壕。”^④ 特别是冬季，四野冰封，酷寒漫长，又常伴随暴风雪，造成“白灾”。

在 200 多万平方公里的蒙古高原，地面河流为数不多。色楞格河较大，流经高原中部偏北。鄂尔浑河、图拉河等都是它的水系。鄂嫩河、克鲁伦河、海拉尔河、西辽河等均在高原东部，札布汗河位于高原西部。上述河流除个别外，水量均不太大，并带有明显的季节性。河流稀疏，加重干旱程度。

高原沙漠较多。瀚海又称“戈壁”或“大漠”，因广漠无垠，浩瀚如海，故名。其实，它是由不同类型的沙漠和沙漠中的草原组成。所谓“大漠南北”就是以它为界的南部和北部，即漠南、漠北，亦称幕南、幕北。此外，还有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等著名的

① 陈子昂《为乔补阙论突厥表》，载《陈拾遗集》卷 1。

② 《元史》卷 2 《定宗纪》，中华书局点校本。

③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第 26 页，中华书局，1985 年。

④ 《金人出塞图》，载《虞文靖公道园全集》卷 6，古棠书屋丛书本。

沙漠。

高原土壤不一。栗钙土分布较广，因含有有机质不等又分为几个类型。还有黑钙土、盐渍土、草甸土、沼泽土等。栗钙土有一定的肥力，黑钙土有较高的肥力。上述土壤和气温适合牧草生长，所以高原的草场分布广，面积大。有的一望无际，风吹浪起，波波连天；有的为山岭、河流分割为小块，草绿茵茵，云岗相接。草的种类也不算少。禾本科中的禾草为多，依据湿润程度还有相当数量的杂草，其中豆科占一定的比重。这些禾本科、豆科植物，多为牲畜四季所喜食。呼伦贝尔、锡林郭勒、大兴安岭南端至西辽河流域等地区，牧草茂密，种类繁富，覆盖率高，营养价值亦大，在古代便是理想的牧场。色楞格河、鄂尔浑河、图拉河、克鲁伦河等的两岸，阿尔泰山东麓，杭爱山、肯特山地区，就是今天也有许多优良的草场。七八百年前蒙古汗国时代，蒙古草原的自然条件，应比今天更加优越。这一切，形成了畜牧业生产的必然性及其发展的巨大潜力。

蒙古高原还有多处大片森林，主要分布在北部接连不断的山区。“林木中百姓”的主要部分就生活在这里。蒙古汗国镇压秃马惕人起义时，须在森林中穿行，为此不得不伐树开道，可见森林之茂密。杭爱山、大兴安岭和阴山某些地区，松柏郁苍，古木参天，犹如千云蔽日。林海深幽，郁郁葱葱，构成高原上的另一种自然景观。

蒙古高原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制约，当然不是绝对的，但毕竟有长期的、巨大的影响能力。特别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古代，人们只能在不违背环境的各种规律之前提下，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可能，利用或者改造环境，因此它必然与人们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

一、旧石器时代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在遥远的古代，蒙古高原就是人类劳动生息、繁衍的重要地区之一。

漠北东部赛音山达附近砾石层中，出土了以石英岩等为原料的原始砾石石器，如石斧、砍斫器。在该地西南亚赫山发现一处大型石器制造场，具有典型性的器物是以当地硅质岩为原料的阿舍利手斧。同类文化遗址在戈壁阿尔泰地区哈斯乌斯湖畔索蒙呼勒特也有发现。最早遗址距今约 20 多万年。以砍斫器为代表的砾石石器传统与阿舍利型手斧为代表的手斧文化传统并存，应是当地旧石器早期文化明显的特征。戈壁阿尔泰地区博格多索蒙遗址可作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代表。此外，南部的奥特森蒙特遗址、西部戈壁阿尔泰地区一些洞穴遗址等，也反映了中期文化特征。漠北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广泛分布在色楞格河、鄂尔浑河、图拉河流域以及今天蒙古国杭爱省、布尔干省和东戈壁省等地。丰富的遗址表明居民数量明显增多。

漠北地区旧石器时代各类文化因素具有一些相同点。如遗址多半位于石料开采地，石器加工技术相对固定。同时也有差异。如石器种类有侧重，刮削器形状有差别，这说明漠北地区生活着不同文

化传统的许多原始人群体。

漠南旧石器时代遗址陆续有所发现，情况也逐渐清晰起来。

呼和浩特保合少乡大窑村石器制造场的发现，将内蒙古历史提前到距今 50 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早期。至少从那时起 猿人就来到这里开采石料，制造石器。该石器制造场一直延续到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原始人群以这里的燧石为原料，使用锤击法制造石器。这些石器台面不加修整 石核利用率很高 以刮削器为主 砍砸器次之，石球晚期为多。器形偏大 但有由大变小的趋势。刮削器背面隆起，呈龟背状 被称为“龟背状刮削器” 适用于剥兽皮、刮兽肉和加工皮革，在中晚期地层中均有出土，为该石器制造场的典型器物。大窑遗址有力地说明呼和浩特地区也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发祥地之一。

伊克昭盟乌审旗萨拉乌苏河畔出土人类化石 23 件 其中有一颗少儿左上门齿化石 被命名为“河套人” 相当于 5~3.5 万年 属于晚期智人。萨拉乌苏的动物化石很多 有诺氏古菱齿象、披毛犀、野驴、野马、普氏羚羊、河套大角鹿、原始牛等，表明这一带气候温暖，以草原为主，兼有针阔叶混交林。萨拉乌苏文化遗址出土很多石器，多以石英岩和燧石为原料。刮削器较多，种类复杂，还有钻器、尖状器、雕刻器等，尺寸较小，用锤击法打制。

此外，清水河县、托克托县和准格尔旗的黄河沿岸，卓资县火石窑沟、武川县二道洼村、翁牛特旗老虎洞山等地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址。

二、新石器时代

在漠北，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较广，大体可分为三期。

1. 公元前 4 千年前后。以雅马特诺尔类型居址为代表，有长短刮削器、棱柱形石核，间或发现绳纹陶器。

2. 公元前 3 千年前后。以奥包敖特、塔姆查格布拉克等遗址为代表。工具制造在很大程度上保留前期传统，但出现石刀。

3. 公元前 2 千年前后。以克鲁伦河沿岸及西绍尔文湖畔的遗址为代表。打片技术为两面修整工具的方法所排挤，出现带后锋的石镞。

第一期，部落从事狩猎和过着半游动的生活。第二、三期开始向生产性经济转化。在塔姆查格布拉克等遗址中，发现半地穴房址，还有石锄、石磨盘和石杵，说明个别地区有了定居和原始农业。在诺罗布勒乌拉墓葬中发现了装饰品，有珠子、用野猪獠牙制成的垂饰、膏泥垂饰、动物雕像等。还有嵌燧石片的双刃骨匕首、刀形石片及刻着人面的石护身符。后者是蒙古高原最早的拟人象。墓葬中，死者身上撒赭石粉，骨架染着颜色。单独埋葬牛颅骨，可能是图腾崇拜或动物崇拜。墓葬主人属大陆蒙古人种。

漠南，新石器时代遗址提供的资料更加丰富。下面介绍几个典型的遗址。

在东北部的札赉诺尔发现人头骨化石，定名“札赉诺尔人”。同时出土的还有牛、马、鹿、羚羊、狼、猛犸象、鼠、兔、鱼、鸟等动物化石。文化遗物有骨锥、骨刀梗、骨鱼镖、石镞、刮削器、石叶、石核等。学者多认为札赉诺尔人及其遗物距今一万年左右。

兴隆洼文化遗址位于赤峰敖汉旗兴隆洼村的台地上，距今约七千年。房址排列整齐，多为圆角方形或长方形，半地穴式，屋内设储物窖穴。深腹筒形的夹砂陶罐较多，器表布满好几种饰纹。还有少量的钵、杯、盅等，均为手制，火候较低。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分打制、磨制、压制、琢制四种。锄形器是打制石器的代表，斧形器是磨制石器的典型。遗址中，发现许多鹿孢的角、骨骼和胡桃楸果实硬壳。上述事实说明，这里有相当大的一片森林，人们定居，从事农业，兼营采集和狩猎。

红山文化由赤峰市红山遗址得名，分布在西拉木伦河南及大小凌河流域，测定为公元前3500年。石器以磨制为主。掘土石耜有烟叶形和草履形，桂叶形双孔石刀富有特点。说明农业经济占重要地位。陶器主要有大口深腹罐，其次是折口深腹罐、斜口罐。大口、深腹、小平底是其共同特点。另有钵、盆、瓮等。常饰有直线、曲线划纹和“之”字线纹。出土器物中还有玉制品，近年在喀左县东山咀和凌源、建平交界处牛河梁发现“女神庙”和积石冢群，为红山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大批新材料。表明红山文化后期社会发展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另外，在漠南的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巴林左旗北富河文化、敖汉旗的小河沿文化等也都独具特色。

阿善遗址在漠南中西部新石器文化中富有典型性。它位于包头市东阿善沟门。阿善一期文化的时间相当于中原仰韶文化早期。打制石器中有砍砸器、石球和磨盘、磨棒。陶器均手制，有钵、盆、罐和双唇小口瓶等。二期文化时间相当仰韶文化中晚期。有陶环、石环、骨簪、项饰等。彩陶饰纹愈加复杂和多样化，有内彩和红黑复

彩。生产工具有大石器、细石器和骨角器。三期文化相当于仰韶和龙山文化之间。有石墙房子和窖穴。石斧、石镰等制作规整、精细。还有陶刀、陶纺轮。阿善诸期文化各具特点，相互叠压。同类文化在清水河白泥窑也有发现。

三、青铜时代

临近中原的辽西、内蒙古中部及西南部等地大体与中原同步进入青铜时代。

赤峰市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是有明显特征的青铜文化，距今 3965 ± 90 或 3550 ± 80 年。分布在老哈河流域、辽西、燕山南北、锡盟东南、北越西拉木伦河，西至张家口、宣化。青铜器多为小刀、镞、耳环等小型工具和装饰品，还有小陶范、铜屑等，说明人们已掌握一定的冶铜、铸铜技术。陶器以青灰色为主，火候高，器表多饰绳纹，有轮制、模制和泥条盘筑三种。筒形鬲可作为典型器物。石锄、石铲、石刀等有打制和磨制，这种工具说明农业生产的存在。猪、狗、羊、牛、鹿科动物的骨骼及大量骨器，说明驯养很多动物。聚落多在河岸高地，房址数十乃至百余座不等，以围墙、壕沟为防御，墙用石砌和夯筑。墓地大者近千座，排列有序。用木或石作箱形葬具，以陶礼器、玉器、玛瑙珠和猪、狗为随葬品，数量不等，反映贫富差别。夏家店下层文化对于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既有传承，又有创新；是与夏商文化并行的青铜文化。二者各有特点，但互相影响是相当明显的。从时间、空间看，此夏家店下层文化可能包含早期肃慎、燕毫、孤竹的器物。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年代相当于公元前 1000 年至前 300 年。青铜器种类较多。有刀、锥、斧、凿、镞、矛、短剑等工具和武器，饰花纹于柄并柄身连铸的各种短剑，具有地域特色。鼎、鬲、豆、罐等炊具和容器也不少，其中双连罐、双耳鬲、豆形器等造型别致，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所特有。陶器制作粗疏，火候不高，多为手制，器表磨光，纹饰单调。居址为地面建筑和地穴建筑两种，设袋形穴窖。墓葬在聚落附近，有石砌棺、木制棺。赤峰市宁城南城根一号墓出土青铜器 500 余件，其中有一套中原常见的青铜礼器，墓主是贵族。同一墓葬还有地位低于贵族的武士，戴铜盔，佩戈矛短剑等青铜武器。另有人葬于废弃的窖穴或住址中，无随葬品，甚至三四人葬一个单元。墓葬情况反映夏家店上层文化社会的多种等级。农具只见半月形石刀，表明农业生产简陋。出土大量牛羊猪狗马等动物的骨骼，从青铜马具和骨板刻划的图像看，马用于乘骑、拉车，反映经济日趋畜牧化。从地望、年代看，夏家店上层文化应属于东胡及山戎。许多青铜器物，如马蹄足盆形鼎、铜镜、二穿戈等和东西周时期器物雷同，说明与中原文化的密切关系。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集中体现内蒙古中部及西南部的青铜文化。它起源于鄂尔多斯及其附近地区的土著文化。晚期相当于匈奴文化。其中朱开沟遗址具有典型性。该遗址位于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朱开沟村。先后发掘房址 87 处，灰坑 207 个，墓葬 392 座，可复原的陶器 5000 余件，石器、骨器、铜器 800 余件。分为五段三期。陶器以灰陶为主，口沿带附加堆纹的花边鬲、蛇纹鬲和三足瓮等呈现地方特征。三至五段墓葬中出土大量铜耳环、铜臂钏、铜指环、铜针、铜戈、铜短剑、铜刀、铜镞、铜盔。还有粗糙的鼎、爵等。合

葬墓中，男仰身直肢，女面男侧身屈肢。还有多人合葬墓，男居中仰身直肢 左右熟土二层台或脚下葬有侧身屈肢面向中间的女性 可能是殉葬的家奴、妻妾，表明等级差别。与朱开沟同类的文化遗存分布相当广，还有准格尔旗大口、张家塔、清水河县白泥窑子、吕家坡、包头阿善、呼和浩特黄土坡、凉城毛庆沟等。各遗址文化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是明显的。

鄂尔多斯式青铜文化对周围地区产生过很大影响。在河北北部和内蒙古东部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遗物中 有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伴出，说明东西两支文化的交流和影响。同时，鄂尔多斯式青铜文化影响漠北，又通过漠北传递到南西伯利亚。

三

蒙古高原先后哺育了许多民族 他们都有着多姿多彩的历史。下面仅就建立过较成熟的政权 而又影响较大的民族谈几个重要问题。

一、诸族政权概况

新石器时代末至青铜时代初 蒙古高原及其附近地区分布着许多支被称为“狄”、“胡”、“戎”的游牧部落群体。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逐渐形成部落联盟。其中，主要的有匈奴部落联盟、东胡部落联盟。前者逐渐占领蒙古高原，并以它为中心，不断扩张势力，在

其杰出人物挛鞮氏冒顿的领导下于公元前 209 年(秦二世元年)建立了蒙古高原的第一个较成熟的政权匈奴单于国，从而打开了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文明的大门。两个半世纪后，匈奴政权分裂为南北两部，并逐渐失去控制高原政治局势的能力。

其后直至蒙古汗国前，我国北方民族鲜卑、柔然、突厥、薛延陀、回鹘和契丹，在历史潮流的推动下，先后建立规模略异，统治时间长短不一，但都很强大的政权，其名称和时间分别为：

鲜卑檀石槐政权(135—181 年)

柔然汗国(402—555 年)

前突厥汗国(552—630 年)

薛延陀汗国(628—646 年)

后突厥汗国(679—745 年)

回鹘汗国(744—840 年)

辽朝(907—1125 年)

在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

其一，840 年(唐武宗开成五年)黠戛斯人虽然打垮回鹘汗国，但没有建立统一政权，很快回归故地，成为驻牧高原西北及其相邻地区的政治势力。此后数十年间，蒙古高原似乎无“共主”。以女真族为主体的金朝，虽控制高原东缘和南沿，军队也偶尔深入其腹地，但未能有效地控制高原各族各部。另外，金的政治中心远离高原，久居这里的女真人不多。黠戛斯和金对蒙古高原的历史均不有可忽视的影响，然而都缺少作为高原政权的特征，所以很难看作蒙古高原的民族及其政权。

其二，以契丹人为主体的辽朝几经努力，终于将大漠南北广大

地区纳入自己版图，并设置西北路招讨使司、西南路招讨使司和倒塌岭统军使司等军政机构，经略高原各族各部长达两个世纪。契丹人原驻牧高原东南部，辽的政治中心也不离开这里，并且还有许多契丹人从不同渠道进入高原腹地。在历史、民族、人口等方面，对高原影响颇深。辽虽属中原皇朝，但却具有蒙古高原政权的基本要求和特征，所以有理由把它列入高原政权。

从匈奴单于国到辽朝各政权之间，并非完全衔接，有的间隔数十年乃至百余年。因为它们的民族性都很明显，故均以“民族政权”或“民族国家”称之。鲜卑檀石槐政权和辽朝的政治中心，设在漠南；匈奴单于国牙帐先在漠南，后置漠北；其余政权的牙帐均在漠北。各个政权的军事色彩都非常浓厚。他们依靠军事优势，控制蒙古高原，并出入长城，雄视中原，甚至影响东北亚大陆。

以马牛羊为主要产品的游牧业是各政权的经济命脉，狩猎、捕鱼、采集等是畜牧业的必要补充。农业比重虽然很小（辽朝除外），但对任何游牧民族都不可缺少。这些不同行业的生产，为牧民提供衣着、食物，乃至与其他民族交换的商品。手工业、商业大体都围绕畜牧业、狩猎业而存在和发展。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各种经济的比重有所调整和改变，但游牧业在古代北方民族经济中一直占据绝对优势则是显而易见的。

游牧业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形式，使古代北方民族形成不同于农业地区居民的别具一格的物质生活方式、风尚习俗、音乐舞蹈、宗教信仰和心理素质。在蒙古高原形成的这种草原文化，本身就使得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在历史的长河中，高原诸族不断南下，甚而在中原建立政权，致使草原文化影响黄河流域，影响

长江流域，甚至影响整个中国。

从另一角度看，上述诸族尽管同为草原文化，但各自又有许多不同于他族的特点。经济方面回鹘人具有重商的倾向，契丹人显示兴农的趋势。伦理方面匈奴人“贱老”契丹人敬老。丧葬方面，契丹棺殓墓葬，突厥人火化葬灰；匈奴等常有人殉，突厥等流行髡面。军事上，匈奴、突厥、柔然等全军骑兵化，尽在马上战；薛延陀虽亦全军骑兵化，但战斗中时而马步兵结合；契丹步兵、骑兵兼有，步骑配合灵活多变。此外，发式虽多髡，但髡式不尽相同。动物崇拜则各具特色。草原文化表现的“多元性”正是各共同体自身特征的显示。

诸族政权的杰出首领 特别是政权的创建者都具备共同的特点：机智勇敢 施法公允 能征惯战 富于开拓精神 擅长协调部属 具有明敏的政治头脑和灵活的外交手腕 还有对敌人的残酷无情等。他们的作用，常常是举足轻重的。冒顿单于、檀石槐、社仑可汗、土门伊利可汗、真珠毗伽可汗、骨咄禄毗伽阙可汗和耶律阿保机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人物。呼韩邪单于、轲比能、大檀、颉利可汗和耶律德光等也可作为代表。他们均有资格作为本民族，乃至中华民族的杰出人物载入史册。

诸族政权衰落、灭亡的基本原因，大体可归纳为几个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政治腐败，常常是民众不满情绪日益增加，政权基础动摇；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势，进而演变为民族分裂；异族、邻国乘机进攻，促使危机加深。上述情况集中反映了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在长期、残酷的斗争中 生产破坏、政治动荡、军事力量削弱。与此同时，干旱、风暴、严寒、大雪等

自然灾害和瘟疫频频发生，人口、牲畜大量死亡，生产力进一步破坏。矛盾不断积累，当政者又束手无策，最终导致政权崩溃。

古代蒙古高原各民族对蒙古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和血胤等方面，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匈奴的“左右翼制度”，蒙古族广泛采用军队编制十进制经乌桓、柔然传递到蒙古。突厥的某些词汇为蒙古语吸收，回鹘文则为蒙古族借用。察右前旗毫沁营出土的契丹人骨之鉴定结论充分说明，契丹族“后裔须从蒙古近代民族中寻找”，^①反映二者的血缘关系。高原各民族的畜牧业生产技术，最终为蒙古族继承和发展。各游牧民族的骑兵战术，蒙古族将它推到最高峰。北方民族的敬天意识，被蒙古族发展为“长生天”的理论。历史事实表明，哪一个民族距蒙古民族的时间越近，影响就越直接；哪一个民族共同体生存的时间越长，对蒙古民族的影响也就越大。

二、诸族政权递嬗

在蒙古高原建立统一政权的民族，犹如这个政治舞台上的主角，随着政权衰亡，主角也就下台。于是另一个民族重新扮演主角，并经历类似过程。如此一代接一代构成民族之递嬗。有人认为，这里的民族“迅速兴起”又“毫无踪迹地消失”；“一茬接着一茬”的演化，错综复杂，使人“眼花缭乱”实“不可琢磨”。其实不然，只

^① 时墨庄《三号墓契丹男性人骨的测定》，载《契丹女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要占有足够资料，冷静、细致地分析，我们是能透过层层迷雾，看到递嬗过程中的规律性运行。

1. 诸族政权基本结构 ——三系列

蒙古高原诸族政权，一定意义上都是相当繁杂的联合体。各联合体包涵着难以数计的操不同语言的部落、部落联盟、部族、民族。但各政权的政治结构则均可归纳为三个系列。各系列表现出明显的阶级性、民族性。

第一系列在相应的政权里都是最显贵的集团或最显贵的家族。从这个狭小的群体里 通过一定手续 产生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设、特勤、叶护、枢密使和左右相等高官重臣 分别掌握重要方面。最高领导人即单于、汗和皇帝的选择范围，正常情况下，由于血统的限制 当然非斯莫属。他们占据高位 掌握大权 拥有大量奴隶、牲畜和大片优良的草场 享受着特殊待遇 构成政权的核心理部分。然

蒙古高原诸族政权三系列一览表

政权称谓	第一系列 (核心部分)	第二系列 (主体部分)	第三系列 (非主体部分)
匈奴单于国	挛鞮氏	匈奴族人	非匈奴族人
鲜卑檀石槐政权	?	东部鲜卑人	非东部鲜卑人
柔然汗国	郁久闾氏	柔然族人	非柔然族人
前突厥汗国	阿史那氏	突厥族人	非突厥族人
薛延陀汗国	壹利吐氏	薛延陀族人	非薛延陀族人
后突厥汗国	阿史那氏	突厥族人	非突厥族人
回鹘汗国	药罗葛氏	回鹘族人	非回鹘族人
辽 朝	大横帐	契丹族人	非契丹族人

而对于单于、汗、皇帝的大位之争夺，进而导致政变、内战、分裂等 往往亦由第一系列发端。

第二系列大体有共同的语言、地域、文化和意识。广义而言 可称为“族”或“民族”。他们是相应政权的主要创建者、积极支持者，是中坚力量，故享有一定的政治、经济特权，其中，功勋卓著者可步入高级统治层中。因此，可以称他们为该政权的“主体部分”或“主体民族”。个别民族政权中的后妃固定在某一部族中 而北方民族妇女具有强烈的参政意识，所以后族虽属第二系列，但地位格外重要。辽代后族尤为典型。

第三系列屈从第一系列，后者常派出“左右翼”性质的官员、“收税”者、“吐屯”、“监护使”、“招讨使”等前往，以实现对该第三系列的统治。第三系列必须缴纳赋税、担负徭役，有时是很沉重的。同时，还得经常跟随第一系列征战。实际上他们受第一系列不同程度的奴役。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却能保留自身文化，乃至政治、军事传统。故高原许多民族在异族政权统治下，也能悄无声息地成熟起来。他们是各政权的“非主体民族”或“非主体部分”。第一系列出于政治等需要，给予第三系列的地位也不尽相同。

匈奴单于国一向有“百蛮大国”之称，在这个庞杂的联合体里，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乌孙、月氏、乌桓、鲜卑等均属第三系列，即政权非主体部分。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当于氏等，地位可能有高低之别，但都是匈奴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体都享有特权，甚至有资格充当某些官位的世选者，均不失为政权的主体部分，第二系列。挛鞮氏是匈奴族中最显贵的氏族，单于等最高权力必须

集中在该氏族手中。匈奴人“恶种姓之失”^①在这种传统意识的约束下，匈奴单于国的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主体部分与核心部分之界线是清楚的。

柔然始祖木骨间只身逃离拓跋鲜卑军营后，在一段时间里是以“郁久间”相称的小氏族，后来逐渐壮大起来。其第七代孙社仑统一漠北。402年北魏武帝天兴五年创建柔然汗国。它的民族构成颇复杂。据周伟洲先生考证：“属东胡鲜卑的有十四部（氏）十六姓，属敕勒的有九部（氏）十姓，属匈奴余部的有三部（氏）二姓，属突厥部的有一部（氏）一姓，属西域（算作一部）有五姓，属汉族（算作一部）有三姓。”还有大量部（氏）姓尚待识别。他们都是该政权剥削、役使的对象，属非主体部分，是第三系列。广义而言，柔然本族仅“七部（氏）十三姓”，^②为政权第二系列，是其主体部分。惟有郁久间氏才是最显贵的氏族，是政权核心部分，第一系列，掌握汗国最高层的权力。无论斗争如何激烈，其可汗均从该氏族中产生。

阿史那氏、突厥族人、非突厥族部众、壹利吐氏、薛延陀族人，非薛延陀族部众、药罗葛氏、回鹘族人、非回鹘族部众、大横帐、契丹族人，非契丹族部众等等。在相应政权里的关系，也大体如此。

诸族政权各系列的人口数量不同。第一系列的人口，无疑是极少数。第二系列，从政治角度言，虽充当政权主体部分，但一般情况下，在政权总人口中，不一定是多数，特别是该政权初建时期。第三系列的人口，族属虽复杂，但往往是多数。于是各族政权中，三

^①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② 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6~109页。